

素质教育与高考改革新论

刘淋淋

摘要:高考并不必然导致应试教育,也不必然阻碍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应相互适应而变革并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由于高考对于基础教育的严重制约性,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行要求高考首先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与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致力于解决高考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考核和评价素质教育成果这一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期望因高考成为评价素质教育成果的方式可以使其发挥积极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基础教育进一步推进和落实素质教育。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行又能够反过来促进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素质教育;高考改革;应试教育

DOI:10.16391/j.cnki.jyks.2017.06.004

在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行一直举步维艰,容易流于形式,传统的应试教育仍占主流。而高考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素质教育让位于高考的现状比比皆是。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二者如何相得益彰,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以往有不少学者就如何理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内涵和相互关系,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内在关联以及高考改革方案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高考作为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所具有的评价和选拔双重功能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分析素质教育与高考如何相互适应而变革并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一、素质教育的推行及其含义

自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制度,迄今已有四十年。高考恢复之初,受制于当时经济、政治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等因素,高考录取率较低,以“片面追求升学率”为表现的应试教育逐渐盛行。为不断深化教育

改革,针对应试教育提出的素质教育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应运而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首次正式在中央文件中使用素质教育的概念。在汨罗和烟台等地试点推行素质教育取得一定经验后,1997年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推进素质教育。1998年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素质教育承担着培养跨世纪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使命。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发布后,素质教育开始进入国家推进、全面实施的新阶段。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政策理念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1]随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作者简介:刘淋淋,女,安徽六安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年)》中确立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2017年1月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主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使得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如今,素质教育的评价方式主要依托于综合素质评价来进行。2014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综合素质评价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评价内容共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然而,素质教育的推行仍受到高考的严重制约,综合素质评价虽已成为高考招生录取的参考,但在实践中却难以真正实现其价值,目前所起作用还十分有限。

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一般认为,素质应该包括个人具有的所有生理和心理的素养与品质,如品德、智力及体质等;既有先天遗传的因素,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从素质教育的推行过程来看,这一概念其实是直接针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所以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应该与应试教育的概念相结合才能够更加准确。

应试教育与应试不同,考试是一种考核和评价方式,有考试就有应试;如果有考试而无应试,那么考试的价值也无从体现。引导学习者按照考试内容和要求进行应试准备使得考试具有了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作为一种测量工具和评价手段,考试本身并无善恶可言。”^[2]应试就其本质来说,也本无对错可言。而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面对应试的极端功利化结果,否定应试教育不是否定应试本身。正如有学者所言,应试教育在价值上是一个贬义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考试主义或一种以考试为中心并对其他教育价值具有强烈排斥性的教育。^[3]需要明确的是,有考试的教育不等于以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表现的是一种关于教育与考试之间联系的错误的价值判断。考试作为教育的评价方式而存在,是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如果教育过分注重评价方式和评价结果,那么教育自身就本末倒置了。

自从素质教育提出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素质教育的概念,主要从目标层面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来阐述。“注重培养人的素质或者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这样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4]“素质教育是把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当作目的,而把具有选拔与促进功能的考试制度当作手段的一种教育。”^[5]若从价值取向角度看,素质教育带有明显的褒义性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鲜明的对立性。“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它们在形式或事实上是否有考试与应试,而在于考试与应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否与教育的宗旨和人的健全发展相背离。”^[6]基于以上观点,笔者将素质教育界定为“顺应学生的成长规律、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与应试教育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不同,素质教育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回归到人的成长本身。素质教育可以存在考试,考试也可以成为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的手段之一;关键在于考试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是否符合素质教育的宗旨与目标,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需要。但是,受制于目前我国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紧张等现状,考试必然演变成激烈的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竞争,考试的价值取向无形中被架空而束之高阁,考试的评价标准变得单一且现实,素质教育亦存在着走向应试教育的风险。

二、高考竞争与应试教育

尽管我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行和完善素质教育,但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演变为以考试为中心、一切向分数看齐的应试教育。从多年的素质教育实践来看,在激烈的高考竞争面前,体育、美术等课程的开设多是为了响应素质教育的口号,而并未真正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形式化的素质教育课程沦为了应试教育的附庸。人们形容高考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从中可以看出竞争的惨烈程度,经济越不发达地区越是如此。激烈的高考竞争使得基础教育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被迫成为追求好成绩的“学习机器”,教师也处于矛盾和两难之间。几乎每位教师都清楚地知道,践行素质教育可以将学生培养得更出色,可是在高

考面前,往往只能无可奈何地做出功利主义的选择。此外,高考考核的内容也是以书本知识为主,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的测量和评价无法在卷面和成绩上充分体现。高考的激烈竞争及其考核方式的单一机械等缺陷,直接导致了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的盛行和素质教育推行的困难。

似乎问题的症结在于高考,可是高考又何其无辜。高考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考核和选拔方式,考核基础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成果,为高校选拔不同层次与类型的优质学生进行培养。从更深层次看,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选拔和培养各个层级不同类型的人才,保障整个国家体系平稳运行。但毋庸讳言,高考作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之一,其自身所具备的选拔功能,使得这种竞争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更为严重的是,高考是目前唯一受到广泛承认的高校招生的选拔渠道和录取依据,这种带有功利性的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高考竞争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竞争,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优质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稀缺。教育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和政治,教育资源尤其是其中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源于我国当前的国情,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仍然难以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学生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和我国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过度激烈的高考竞争即根源于此。对就业、社会地位等优质社会资源的争夺也转化到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从而加剧了本就难以承受的高考竞争。当资源不足以满足需求、竞争变得扭曲时,高考的唯一性地位和自身所具有的功利化色彩,使得基础教育在高考面前演变成了应试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并不该全部归咎于高考,因为“高考既与应试教育没有天然的‘血缘’,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也并非素质教育的‘天敌’或‘绊脚石’”^[7]。高考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应试教育,也不必然阻碍素质教育。

三、素质教育与高考的“对立统一”关系

总体来看,考试具有评价和选拔的双重功能,评价功能是其根本。考试本是教育教学过程的一部分,

是对教育的考核与评价,是评价教育效果(即评价受教育者是否发生了和教育目标相一致的预期变化)的直接方式。而有考试也就必然有应试,所以教育、考试和应试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联系,且缺一不可。教育与考试之间相互影响且相互制约,教育内容影响着考试内容和考核方式,考试的存在也能反作用于教育和教学,对教育教学起到引导作用。考试竞争愈激烈,教育受考试的引导和制约就愈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考试的评价标准是否和教育目标相一致,也就是考试到底考什么、如何考的问题。考试内容和考核方式必须要能最大程度地考查出教育活动的成果,否则这种评价方式就存在问题。如今的考试内容多是书本知识,考核方式一般以笔试为主,如果我们要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学生,那么这种机械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考核方式是否合理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素质教育与考试并不冲突,任何教育几乎都需要考试这种评价方式,而任何考试也几乎都无法避免竞争,实施素质教育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考试竞争,或者说把考试竞争融入到素质教育系统之中。^[8]那种认为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不可相容的认识是不准确的,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并不对立,二者也不是“天敌”。素质教育也需要考试,但是由于素质教育自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其考核内容应避免僵化,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评价方式也应该多元化,评价标准应与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一致。素质教育也需要应试,但是它“应的是素质教育之试,应的是有利于学生健全发展之试,应的是合乎教育宗旨之试”^[9]。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并非不相容。高考作为一种特殊的考核方式和评价工具,其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是否与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相一致才是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如今的高考所考核的更多是学生的“智育”成果,而不是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程度。如果高考考核的内容是课本基础知识,仅依靠背诵便能得高分,那么考核出的“智育”成果也将大打折扣。受制于中国目前的国情,高考相对于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地位暂时无法彻底改变,如若高考在“考什么”

“如何考”的核心问题上能够逐步调整以适应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那么高考这一“指挥棒”发挥的将是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高考与素质教育在评价功能的角度上是可以达到统一的,但这种统一亟需高考做出与素质教育宗旨和目标相适应的变革。笔者期望看到的是,高考能够最大程度上考查出素质教育的成果,以此来引导基础教育“应素质教育之试”。

当然,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立”。素质教育的推行本应着眼于顺应学生的成长规律,促进每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提升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其无形中带有“普适性”的光环。基础教育中推行素质教育更是如此。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行面向全体中小学生,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带有明显的“全体性”和“全面性”特征。^[10]而高考作为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所承担的是从基础教育中选拔人才的重任,高考自身所带有的选拔性功能和功利性色彩,决定了它绝不可能仅满足于全体学生的发展需求,竞争和分层才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目前存在的教育分层状况中,高考该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我们承认学生的发展有速度快慢之分、程度深浅之别,但应该明确的是:从教育自身的宗旨和教育本真的规律来看,不该否认任何一位学生都有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不带有功利性也许是素质教育与高考最大的不同之处。此外,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进行优化和调整,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终究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与素质教育无法完全“步调一致”。

概言之,从高考的评价功能角度看,高考与素质教育能够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一种价值取向层面上的统一;从高考的选拔功能角度看,高考与素质教育存在着固有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是一种事实层面上的对立。受到当前国情的制约,高考的选拔性功能和功利性色彩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强化,二者之间的对立始终难以转圜;高考与素质教育在其评价功能上的统一与相容,将会是高考改革的突破口。

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高考改革和素质教育在推行的迷途中暗示了方向。由于高考对于基础教育的严重制约性,素质教育如果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深入推进,高考必须首先做出适当

调整来与素质教育相适应。与其说问题又回到高考身上,不如说追溯到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高考自身所带有的功利性、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传统的考试文化等因素都使得高考变革异常艰难。然而,即使再艰难困苦,为了基础教育的长远发展,为了青少年的身心全面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培养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后备人才,为了顺应教育本真的规律,我们也应该一步一步地尝试。高考哪怕一个微小的变革,都能带来深远的改变。

四、素质教育与高考如何相适应

高考与素质教育在其评价功能上的统一,为二者能够相互适应而变革并最终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行要求高考首先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与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致力于解决高考如何能够最大程度上考核和评价素质教育成果这一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期望因高考成为评价素质教育成果的方式可以使其发挥积极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基础教育进一步推进和落实素质教育。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行又能够反过来促进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

(一) 高考制度如何调整

素质教育追求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其教育成果难以仅用量化标准来评价,要求高考制度在考核内容、招录方式和人才评价上更加科学和多元。就统一高考自身而言,目前推行的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两考等改革措施虽已使其日益完善,但其科学性仍有待提高。高考考核内容理应在知识立意的基础上强化能力和素质立意,题目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书本知识而应侧重于考查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题目设置要体现出明显的区分度,多设置开放性问题 and 自由表达观点的问题,以期让学生的知识素养、思维水平和个性想法等在答卷上得到充分展示。但必须承认的是,以答卷方式完成的统一高考存在固有的缺陷,评价标准单一和考核方式死板等问题始终难以根治,既无法充分满足素质教育发展的诉求,也难以真实地评价出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程度,推动招生录取多样化与人才评价多元化势在必行。^[11]

“理想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使所有的高校挑选合适的生源,使所有的学生选择最合适的高校,体现双向选择原则的制度。”^[12]双向选择原则的实现能够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其核心应该是自主选择权,尊重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和学生的择校自主权。招生录取多样化与人才评价多元化的实现,有赖于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如此,既能满足高校更加精准地甄别和选拔人才的需要,又能给予学生更充足的选择空间,也有利于更充分地评价素质教育的成果。因此,为适应素质教育需求而进行的高考制度变革应以实现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为前提。而是否采用及如何采用高考成绩、能否自主制定招生计划与方案等,应是目前衡量我国高校招生自主程度的“实用标准”。^[13]

高校自主招生就是基于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而进行的对高考招生录取多样化改革的积极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及其评价机制的完善。部分高校自2001年开始试行自主招生的办法,打破统一高考的“垄断”局面,以期以与考生“直接对话”的方式挑选出合适的生源,其中不乏偏才、怪才。然而,一方面,高校自主招生仍以高考成绩和分数线为基准,对于选拔真正的偏才、怪才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自主招生又否定分数是唯一的录取标准,采取的是对高考分数大幅度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人们普遍担忧此举会因人情干扰和监管不足而产生权力寻租。自主招生陷入了一种矛盾的两难境地,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难以取舍,逐渐偏离选才的初衷。此外,自主招生还暗含着城乡、区域以及阶层之间考生入学机会的差异,存在着恶化教育不公的风险。因此,自主招生从实施以来就饱受争议,招生规模一直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在教育承担着过多社会责任的今天,渴望追求高效选才而难以确保公平的高校自主招生必定难以阔步向前,这是目前国情和现实所致。

2011年,浙江省试点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以下简称“三位一体”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2017年,浙江省内共有43所地方所属高校启动“三位一体”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共8所高水平大学也在浙江省试行“三位一体”模式。“三

位一体”综合评价录取体系以学生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高校自主测试成绩三部分为根据,是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机制。三部分成绩中,学生高考成绩所占比重最大,一般不低于50%(少数高校除外),2017年浙江大学将考生高考成绩所占比重从前一年的60%提高到了80%。这与高校自主招生的降分录取有本质区别,它肯定了统一高考的主导性地位,承认了高考分数的评价价值。注重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可以引导学生不偏科学习,掌握各门科目必备的基础知识以促进自身均衡发展。高校自主测试成绩来源于各高校组织的综合素质测试,主要通过笔试和面试来进行遴选。最终,学有所长、专业潜质优秀、综合素质高的考生将会脱颖而出。

高校自主招生和“三位一体”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但是在笔者看来,“三位一体”模式由于承认了统一高考的主导性地位而比自主招生更易于被接受和理解,维护了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教育公平,综合考察了学生各方面素质,这也许是当下一一种更为柔性且更具灵活性和全面性的改革方案。更为重要的是,“三位一体”模式能够带来一种良性循环,发挥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引导基础教育走向综合素质教育,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自我。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的高校自主招生推行过早,“三位一体”模式却推行太迟。但无论何种变革,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人情社会中,带有面试环节的招考改革始终应以厉行监督制度为前提。

招生录取的多样化变革,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传统,必然伴随着人才评价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与带有终结性评价特征的高考不同,综合素质评价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本身。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来“走进”现有的高考体系,与原有的方式相结合共同推动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14]关键是如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并将其纳入高考体系之中。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确实存在信度不高、区分度低、形式化和评价不规范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关键或许恰恰在于,综合素质评价还并未真正融入高考体系,更进一步说,还并未真正成为高校招生的

录取依据。只有有机融入高考体系,这一评价制度才有“力度”可言。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得综合素质评价在基础教育中得以迅速落实和完善,也促使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中顺利推进和发展。

然而,在激烈的高考竞争面前,由于人们对公平的极端追求,分数是唯一被广泛认可的标准,任何企图打破这种标准的变革都难以被世人认可和接受。有鉴于此,综合素质评价应先以“软着陆”的方式走进高考体系,此后再逐步实现与高考体系的“硬挂钩”,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一高考的主导性地位不能改变,综合素质评价应走进高考招生体系而不是走进高考。“三位一体”模式和高校自主招生的变革为综合素质评价的“软着陆”提供了空间,综合素质评价应作为面试环节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标准,成为高校招生过程中了解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基于高考的多元评价模式是高考招生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革的拓展和深化,综合素质评价显然会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笔者看来,理想的多元评价模式应集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于一身。

无论是高校自主招生,还是“三位一体”模式,或是综合素质评价,高考变革的核心问题都应该是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失去公平的大学招考制度,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而缺乏效率的大学招考制度,也就难以保持活力。”^[15]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追求高效在如今也许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公平才是我们始终不应突破和放弃的底线。维护公平可谓是高考存在的最为原始也是最为重要的根基。^[16]教育公平,从来不该是一句空话,而是看高考改革在公平和效率面前到底做出怎样的抉择。在高考社会功能凸显的今天,高考改革必须坚决保证统一高考的主导性地位,既能最大程度上维护教育公平,也能使招考适度分离从而提高选拔效率,充分发挥高考的考核和评价作用。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加以变革,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才是正解。

(二)素质教育如何推行

如若高考制度能够为适应素质教育的需求做出

如上变革,将会对基础教育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为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行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要始终清楚的是,在高考背景下推行的素质教育,绝不可能成为“自由教育”,素质教育终将受到高考的“约束”。

在笔者看来,发展素质教育的重任理应由教育者来承担,主要包括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学校管理者而言,如何在践行素质教育过程中平衡高考竞争和素质教育二者之间的“矛盾”是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学校管理者对于素质教育理念的理解和坚持程度。一所学校的素质教育发展状况深受学校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影响,学校管理者理应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本质和内涵并坚持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合理设置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课程,合理规划考试频率与考试方式,不以成绩为中心片面追求高升学率,不以学生成绩为考核教师的唯一标准,开设兴趣课程、开展校园活动来引导学生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营造健康和谐自由宽松的校园氛围。学校就如同土壤一般,教育者施肥浇水使其成为沃土,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丰硕的果实。

高考与素质教育相互适应而做出适当变革,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可谓是某种程度的“解脱”。以往受制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为了保障课堂授课“效率”,教师多采用讲授法教学,学生多是被动的接收者,容易演变为“填鸭式”教学。有了高考的引导性变革,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理当且必须摒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多采用引导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方法开展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因人而异地发展自身特长和兴趣爱好,不以成绩论“英雄”。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17]在教育学生“成人”和“成才”二者之间,教师理应坚定不移地首先选择前者,保证学生道德品质这一底线。此外,无论高考做出怎样的变革,素质教育仍需应试。教师在践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同样应该警惕走向应试教育的危险。

素质教育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在接受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应该摒弃功利化的学习观念,转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拓宽自己的视野,主动提升各

方面的能力和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兴趣爱好以寻找到自身的专业兴趣所在。直到高考填报志愿时还不知道自己对什么领域感兴趣、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对自己的未来毫无规划的学生大有人在,甚至走进大学校门后仍然怀揣迷茫心态的学生也有不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暗示着基础教育的失败。基础教育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学生具备必备的知识素养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更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个性,有理想和目标、有内在和自我。学生是否明确自身的理想和志趣也应该成为评判素质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学生需要在教育者和家长的帮助与引导下主动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和心之所向,立下自己的志向。

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塑造自我、确立志趣和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时期,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形的过程,很难用量化标准来考核评价但却是教育的本真所在。也许,教育本就不该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让每一个学生在身心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富有个性的发展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18]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行虽受制于高考,但始终不应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追求。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对提高我国的人才培养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素质教育与高考之间相互适应而变革固然美好,然而,这样的愿景到底何时才能实现,却不是教育本身所能决定的。受制于我国的国情现状,如今的教育承受了很多本不该承受之重,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究其本源,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期望,未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为高考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带来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 [1][5]苏君阳.素质教育认识论的误区及其超越[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 [2]刘海峰.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J].红旗文稿,2006(17).
- [3][6][9]刘朝晖,扈中平.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性[J].课程·教材·教法,2005(10).
- [4][8]杨启亮.困惑的思考:在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之间[J].课程·教材·教法,2007(11).
- [7]郑若玲.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系新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7(Z1).
- [10]“素质教育的概念、内涵及相关理论”课题组.素质教育的概念、内涵及相关理论[J].教育研究,2006(02).
- [11]郑若玲.破除统考迷思深化招生改革[J].复旦教育论坛,2016(01).
- [12]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2007(11).
- [13]郑若玲.自主招生改革何去何从[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4).
- [14]周先进,张睦楚.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J].全球教育展望,2014(07).
- [15]张亚群.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制度选择[J].复旦教育论坛,2006(03).
- [16]郑若玲.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
- [17]柳斌.柳斌谈素质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4.
- [18]刘志军.关于综合素质评价若干问题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6(01).

(责任编辑:王伟宜)